

# 未免有情

舒  
芜  
随笔

东方出版中心

当代中国学者随笔

W E I M I A N Y O U Q I N G

舒 芜 著

当代中国学者随笔

# 未免有情

舒 芜 随笔



东方出版中心

---

##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

未免有情——舒芜随笔

舒 芜 著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0.7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 240千字 插页5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 1997年1月 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东方出版中心海峰印务公司

印数: 1—10,000

---

ISBN 7-80627-137-6/1·55

定价: 18.00元

---

## 题 记

东方出版中心有出版“当代中国学者随笔丛书”的计划，要我也来一本，于是编成此集。一面编，一面自问，我能算“学者”么？杂学之类，也曾略涉皮毛，倒不是全无关系。但据时论，学术就要纯学术，不要带一点情绪，特别是不要有一点“激进主义”；学者在学术之外，可以不关心也可以很关心社会正义事业，他的学术则应该离社会愈远愈好，否则就是“广场派”，就是自命“精英”，自作多情，不足与于学者之林，云云。我拿这个标准将自己横量竖量，怎么也不够“学者”的尺码。

此集所收，主要是1995年以来的读书读报随笔，以及十多年来陆续写下的关于父兄师友和自己的回忆。这样一编，特别看得清楚，原来我自幼学之年，至今70多岁，不曾有什么长进。幼年读“五四”之书，信“五四”之道，后来所读稍杂，所信稍广，仍有一条主轴，就是当时看来什么最能彻底实现“五四”之道，便信什么（也许有的过后看来并不如此，是另一问题），师友之间也多是在这方面谈得来的。所以这些文字里面，情绪的东西有的是，“激进主义”也少不了，如能列入“当代中国学者随笔丛书”，要仗编辑部的破格宽容。

这也罢了。难的是书名，一切编好之日，还没有想出来。出去散步，在书摊上看到一本《中统秘闻——一个健在的中统少将的回忆》（郑蕴侠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目录上列有“制造‘沧白堂事件’”、“充当‘校场口血案’指挥”等章节，这些都是当

时震动极大的事件，我当时的“激进主义”的情绪记忆犹新，这可得买一本看看：回到家来，信箱里有一封厚厚的信，是高瑞泉教授寄来的王晓明、朱学勤、高瑞泉的三人谈《被遮蔽与被阻隔的——从第二种“反省”谈起》（载《中国研究》1996年2月号）。我先将“三人谈”读了一遍，再翻《中统秘闻》，重温了当时那种血腥、恐怖、无耻、野蛮，第一次看到一个亲身率领职业打手在现场行凶的特务头子揭露黑幕。原来，从1946年1月1日起，中国民主同盟和民主人士组织“政治协商会议各界促进会”，每天夜间在重庆沧白堂举行公开演讲，由参加政协的知名人士直接向群众报告当天政协会议的情况，其用意当然是揭露国民党毫无协商诚意的真相，向国民党施加压力，但其手段完全是和平合法的，其目的也完全是要在抗战八年之后实现和平民主建国的局面。蒋介石表面上同共产党、民主党派、各界人士进行协商，实际上决心大打内战，实行独裁卖国统治，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直接动员群众的活动，下令破坏。中统特务作了周密的部署，连日在演讲会上干扰演讲，侮辱演讲者，捣砸会场，殴打听众，是为“沧白堂事件”。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大局之下，在国际国内要求和平民主的强大压力之下，政治协商会议终于以通过了大体上和平民主的决议而闭幕，蒋介石也不得不让国民党的代表在决议上签字，同时准备马上公开推翻它。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又遭到中统特务周密部署好的大破坏，打伤了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反诬他们打伤了“群众团体代表”（都是特务分子），群众受伤者更多，是为“校场口血案”。这些事件早已写上历史，本不待《中统秘闻》来写。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书中几次点明，在蒋介石一人之下万人（特务们）之上的中统特务总头子就是陈立夫，他何时何地召见哪些特务头子作了哪些血腥的传达部署。这些在我们老头子也

不是新鲜事,虽知之无此详确,但大体上早就知道;对于今之中国青年人恐怕就很新鲜,因为近年来只见一些新闻报道,说陈立夫如何在台湾主张中国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如何研究《易经》了。但我更有兴趣的是,当时那些被侮辱被打伤被反诬的知名人士,如梁漱溟、张东荪、李德全乃至曾琦、李璜等,当时何尝不是要以和平的手段,通过和平的途径,使中国进入和平民主之域呢?他们哪里是暴烈成性,惟恐天下不乱呢?不是别的,而是特务的拳头石头刀棍,不许他们走和平的道路,只许他们站到人民解放战争这一边来推翻蒋介石,其中硬不肯站到这一边的,便只好站到“戡乱”总统蒋介石那一边。革命从来不是革命的一方引发的,而是反革命的一方千方百计引发的,五十年前的沧白堂、校场口事件就是无数铁证之一。重温这些事件,重新体验了我当时的“激进主义”的情绪,忽然,我这个随笔集的书名似乎有门儿了。

于是,我第二遍读王晓明、朱学勤、高瑞泉的“三人谈”,许多话我都有所会心,文繁不便一一摘抄,只说第三节里高氏的这几句话:

慈禧太后用刀斩六君子这种方式堵塞了改良这条路,温和的梁启超也一度激进起来。历史就是这样,不断地试→矫正→再试。所以,激进不光是思维的逻辑而且是历史的逻辑,根本上是社会条件激发了激进思想。当然它又进一步影响了20世纪,但仍然只是原因的一部分。20世纪中国在现实操作层面上有许多失误,给人们很大的受挫感。温和的改良的运作方式受挫,人们就很难拒绝走向激进。你没有理由要求人们把情感意愿都泯灭掉,以完全理性的方式慢慢等待,或者说等待历史按理性去演变。

#### 4 当代中国学者随笔·未免有情——舒芜随笔

---

这几句话顿时启发了我：浮屠尚且不在空桑下三宿，惟恐有情，何况我辈凡夫，对这个一辈子离不开的世界，更无法不有种种情，无法不把情带进自己仅有的一点皮毛之学中去。于是，书名也就有了，曰：《未免有情》。谨此识其缘起。

1996年3月24日

# 目 录

题记·····	1
何来“断层”·····	1
记《墨经字义疏证》·····	5
我有一分责任·····	10
历史有用吗·····	12
关于不读书的信·····	15
“人还在,心不死”考·····	18
又是《论语》么·····	22
忘掉“永久性”·····	25
发聋振聩之声·····	28
鲁迅批评《四库全书》的根据·····	31
《阿Q正传》的诞生地·····	36
[附]挪用晋款修复鲁宅议(邵燕祥)	



这里该夷为平地么 .....	41
〔附一〕呜呼，八道湾（邵燕祥）	
〔附二〕1996年3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专讯	
想象之笔莫轻纵 .....	47
理论勇气和宽容精神——张铁荣作《周作人平议》序 .....	50
〔附一〕无端的困惑（蔚明）	
〔附二〕几点说明（舒芜）	
周作人攻击“文章作态”之所指 .....	61
周作人日常生活浪费一例 .....	63
《知堂小品》中的小纸条 .....	66
胡适的认错 .....	70
“五四”尚未成功，妇女仍需努力 .....	72
“男性心理”的文野 .....	75
看看这个标本 .....	79
不仅是封建的帐 .....	85
干女儿弟子之类 .....	95
也该有“大女人散文” .....	98
“天癸”何物 .....	101
前无古人的笺注 .....	104
删除和省略 .....	114
“一口钟”的笑话并不难避免 .....	119
'95压岁文 .....	123
也谈辛亥和“五四”时期安徽的知识分子 .....	126
白色的飘颻 .....	134

---

家馆滋味忆吾师·····	142
忆台静农先生·····	147
遥祭吴白匄教授·····	172
忆杨荣国教授·····	180
人海波涛共几回——哭诗人陈迹冬·····	192
让那伐木者醒来·····	201
〔附〕长歌行——读舒芜《让那伐木者醒来》(黄苗子)	
大乘菩萨式的文化大师·····	215
舒谏小记·····	219
“桐城派”与桐城文化·····	226
我非方苞之后·····	229
北京是我的故乡·····	234
我的怀乡·····	243
私塾里的背诵·····	253
小书柜——我的精神摇篮·····	257
发表欲、出版梦·····	261
惊心少作·····	265
初宴·····	272
忆安庆·····	275
桂林四忆·····	281
忆武库街·····	291
乡场教育家们·····	298
岭海传薪正有人·····	305
中国古典文学整理出版工作的开端·····	310
历史需要我们作证·····	315
苦瓜·····	323

4 当代中国学者随笔·未免有情——舒芜随笔

---

人是多么有限的存在·····	326
和平时期的怅惘·····	329

## 何来“断层”

有人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反得太彻底，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层。有不少人应和此说。我却不能理解，不知道何来“断层”！

大概也是多年来讲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讲得太热闹了：似乎舞台大幕一开，锣鼓喧天，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大将，一个接一个出场，率领千军万马，把旧势力杀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其实何尝有这么一回事？当时也就是那么几位声名不彰的先觉者，在北京的两三家报刊上写写文章，鼓吹鼓吹新思想。尽管北京足以影响全国，足以吸引国际的注意，尽管当时许多地方都有觉醒的青年，关心聆听着北京的声音，但从全体而论，弥天黑暗还正笼罩着中国，看来休想动它分毫。所以，钱玄同劝鲁迅写文章，鲁迅一听就明白，这是《新青年》的同人感到寂寞了。他于是站出来呐喊，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们不惮于前驱。没有人比鲁迅更深知痛感古中国的麻

木冷漠了，在《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风波》、《阿Q正传》这些名篇里面，鲁迅反复地写出了古中国的麻木冷漠的可憎可鄙而又可怕，它似乎是无形无声的，然而又是狰狞的、血腥的、蒸腾着人肉筵席的“芳香”的。鲁迅不是用呐喊来掩盖它的存在，而是用呐喊来提醒先觉者时刻不要忘记它的存在。鲁迅控诉古中国的仁义道德无非是吃人的道德，古中国的文明无非是人肉筵席的文明，是当时最激烈的言论。鲁迅的控诉都有充分的根据，他的那些名篇里的平凡的生活、停滞的角落，就都是他的根据。正是咸亨酒店里的掌柜、伙计、顾客乃至孩子们的冷漠的取笑，吃掉了孔乙己。正是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的轻薄的调笑，在咀嚼着单四嫂子。正是驼背五少爷、花白胡子乃至华老栓、华大妈、小栓，伙同夏三爷、康大叔、红眼睛阿义一起，屠杀了夏瑜。阿Q先是兴高采烈地看杀革命党，终于又被当作革命党，被枪毙在蚂蚁似的看杀头的人们的喝彩声里。

即使是鲁迅这样最强有力的呐喊，对于古中国的弥天的黑暗，匝地的麻木，其实也不会有什么立竿见影之效，何况“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者提出的许多具体要求，今天看来实在平凡而有限得很。例如，白话文、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男女同校，这些在今天算得什么呢？可是当时，这些就引起了旧势力的最疯狂的仇恨。正如鲁迅所指出，当时单是对于提倡新式标点，就有人恨得要“食肉寝皮”。鲁迅完全不是过甚其词。林纾在他的影射小说《荆生》里，就设想有一个“健男子”荆生，把三位提倡新文化者（实指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痛打一顿，并且声称本可杀掉他们，今且不杀，“留尔以俟鬼诛”。他举出那三人的该杀的言论，不过是反对孔子、反对旧道德、主张白话文而已。改革者方面的言论，何尝有过这些血淋淋的诅咒？鲁迅的“救救孩子”、“掀翻吃人的筵席”等等呼声，比起来太温和了。

我实在不懂，有些人为什么单是记住改革者这句话“过激”、那句话“尖刻”？为什么对于反改革者的凶狠残忍就视而不见，见而不怒，怒而易过易忘？近些年来，《新青年》、《新潮》、《语丝》等著名的新文化报刊，都已重印出版，这是好事。然而另一面却未曾顾到：和这些刊物同时，全国报刊之多，它们所登载所报道的反改革的人、事、言、行之充塞着整个中国，拿来一比，就要把几家新文化的报刊比成九牛一毛，沧海一粟了。那样大的数量，今天要全部重印，自不可能，也无必要。不知有没有研究者肯下一番功夫，精选出一部反面材料的资料集来，给我们做个比较，也许可以使我们的头脑清醒一些。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大成功，当然不容低估。它对于古中国的反科学反民主的旧文化，给予了永远不可能痊愈的损伤。它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日益成长壮大的文化新军，提出了一整套全新的是非标准和价值标准，矗立在旧文化的对立面。这些都是怎么估价也不会过高。但是，如果说它已经把旧文化全部反掉了，甚至把整个民族文化传统都反掉了，造成了什么“民族文化的断层”了，那又是高得太离谱，以此为罪，它不敢认罪；以此为功，它也是不便居功的。事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反对的那些旧文化，后来一直在中国大地上不断地滋生着，何曾有什么“断层”？就说“吃人的礼教”吧，自从《狂人日记》发表以来，中国大地上，特别是广大农村里，只要有礼教存在的地方，又有哪一天不是继续大量地在吃人，在嚼着，吞着，津津有味地品味着？有些时候，特别是在人民革命的声威震慑之下，它在形式上可以有所不同，但骨子里还是依旧，形式的变化正是它顽强地坚持存在的方法。鲁迅看得最清楚，所以他一再警告道：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迫害，从来就无以复加了，只有改革者往往还蒙在鼓里；旧势力有使新势力妥协的种种妙法，但它自己是决不妥协的。

今后我们讲中国新文化运动史，要牢记鲁迅的警告，不单讲改革者为何要改革，而且要讲反改革者如何反对改革。把各个时期各个阶段，旧势力(笔和枪)如何穷凶极恶地迫害新文化，如何一以贯之而又千变万化地坚持它的存在，人肉筵席如何一席接一席地开出来，讲深讲透，讲个彻底。这样的新文化运动史，才能使人有起码的是非之心，不致被“断层”说吓得连赔不是。

1992年5月23日

## 记《墨经字义疏证》

世界上并没有《墨经字义疏证》这么一部书，只是我的抽屉里有这么一部稿子，是五十多年前我妄想著书立说的一个“成果”。那时我才20岁，却在研究墨家之学，着重研究《墨子》书中的《墨经》部分。我从《墨经》中挑出十几个哲学范畴，一一加以疏解，写成系列论文十多篇，共约11万字，我把它题为《墨经字义疏证》，是从我所佩服的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套来的。其中只有《释无久》一篇，曾在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上发表，《释体兼》一篇，曾在顾颉刚教授主编的《文史杂志》上发表，为我发表学术论文的开始，都是黄淬伯教授介绍推荐出去的，此外全都没有发表过。

后来我有时重翻此稿，总觉得很可笑。稿子是用文言文写的，稚嫩拙劣，不成样子，这还不说。更成问题的是，我把《墨经》中那些哲学范畴，尽量“拔高”，硬解释成辩证唯物论的范畴，大部分都是牵强附会。又因为国民党统治下的言论禁忌，我避免使



用辩证唯物论的一套范畴术语,另换上自己现造的一套,往往很欠确切,走了原意。我那时对于辩证唯物论的理解,基本上来自前苏联教科书,非常浅陋,可是我又已经对苏式教条感到不满,想加以“修正”,于是又从其他某些流派的哲学中,借来一些东西。结果自然是非驴非马,既谈不到对《墨经》字义作出准确如实的解释,也谈不到戴震那样借疏证古书字义之名来发挥自成一家之学,不过是一个不成功的少年习作罢了。

但是,我仍然珍视这一段学习经历,一直把这部稿本保存下来。这上面有黄淬伯教授批点的墨迹,还有其他一些有关战时文化生活、师友交游的印记,都是值得纪念的。更重要的是,我因为有过这么一段研治墨学的经历,能够如实地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不相信近年来一些不符历史真相之说,说什么“五四”只是一味反传统云云,尽管我并未赶上“五四”时期。

抗战前,我读过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那时才十三四岁,自然不甚懂,但是记住了他着重揭示的贯穿清代学术史的一条规律,即所谓“以复古求解放”,觉得很有意思,却不曾想到它同现实有什么关系。到了40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动文化统制日益加强,反民主的文化潮流浊浪翻腾,其中特别是“新理学”“新儒学”的鼓吹,得到国民党当局的鼓励支持,其政治性很鲜明,最使青年们感到窒息。他们这样以复古来反民主,那么我们能以另一种复古相对抗呢?我这么想着,便回忆起梁启超说的“以复古求解放”的规律,把它同现实联系起来。在四川的一个荒僻乡村里,由于极偶然的机,我读到了梁启超的《墨子学案》和《墨经校释》以及方授楚的《墨学源流》三部书,我惊喜地发现了:原来与儒家同时,就有墨家一派这么坚决地反儒家,且为一时显学。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墨家之书千年尘晦。到